

英汉语义辞格对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emantic Rhetorical Devi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王晓军 孟凡艳 孟庆梅 ○ 著

英汉语义辞格对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emantic Rhetorical Devi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王晓军 孟凡艳 孟庆梅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语义辞格对比研究 / 王晓军, 孟凡艳, 孟庆梅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46-3901-9

I ①英… II ①王…②孟…③孟… III. ①英语-辞格-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315②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326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李健儿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42.5 字数 6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3901-9 / H · 1408

定 价: 8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人们常说,修辞格是那些远离自然和平常的说话方式。它们是表达的公式化和方式,是在某些方面偏离了规则和简朴的说话方式……然而,与其说它们是远离自然和正常的说话方式,不如说在人类语言的修辞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普遍的……其实,我相信,民间生活中一天内产生的修辞格比几天学术讨论中产生的还要多。

——马尔赛(César Chesneau Du Marsais, 1676-1756)

前言

王德春先生曾指出,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界,研究语法的人很多,研究修辞的人相对较少(王德春,2003)。与此类似,杨自俭先生提出:中国古代教育没有西方的逻辑、语法与修辞,以至现当代(这些科目)在我国的教育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汉语界重视语法不重视修辞,外语界更不重视修辞,因此外语教师中研究修辞学的人很少(杨自俭,2000)。杨先生在梳理西方修辞学脉络后指出:在西方 20 世纪初修辞学开始恢复生机,从 50 年代到现在修辞学备受重视,许多学科都来研究它,使它成为一门显学,其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辞格受到重视。美籍华裔学者高辛勇(Karl S. Y. Kao)说辞格之所以重要,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与人类思考运作有关。

两位先生的卓识对本书的写作有如下启示:

首先,有必要继续开拓修辞学的研究。作为当时的中国修辞学会会长,王德春先生于 2000 年组织出版“21 世纪修辞学丛书”,并在总序中写道:现代修辞学既要研究语言的修辞手段和方法,更要研究言语活动的过程和话语整体在修辞学理论的应用和在汉、外语修辞研究方面及时贡献研究成果(王德春,2000)。他重视“汉、外语修辞研究”的表现是将李国南先生的《辞格与词汇》列为该丛书最先出版的一本。而李先生的这本著作与他先前的著述遥相呼应,都属于典型的对比辞格学研究。上述杨自俭先生的宏论即作为《辞格与词汇》的序言出现在学界面前。

其次,有必要深化对比修辞学尤其是对比辞格学的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作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会长,杨自俭先生对此寄予厚望。他在序言中指出:中国的修辞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从 1985 年

至今国内已出版余立三、胡曙中、李定坤、高辛勇、刘英凯、李国南等六人的英汉修辞比较专著(实际可查的应该更多——本书著者注),为今后比较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提出:从比较修辞学的发展来看,我们可做的事情很多,首先比较修辞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自身理论建设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第一位的任务,其次是用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对汉外语辞格进行系统对比研究。还有一个问题叫第三对比项(*Tertium Comparationis*),是指两种语言共有的属性与范畴,这些属性和范畴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那么比较修辞学需要什么样的第三对比项,这是比较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值得同仁认真研究。

本书涉及关于杨先生提到的后两个问题,基本的想法是:

首先,对英汉语语言的对比研究,可以自下而上的归纳总结其异同,更宜注重不同新兴学科领域所提供的“第三对比项”。

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对语言对比研究持不同的看法。吕叔湘先生为杨自俭和李瑞华合编,1990年出版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撰写的题词指出:指出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由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自此以后,深受吕先生观点影响的学人便将此奉为圭臬,认为找出两种语言的“异”才是开展对比研究的唯一目的。萧立明(2006: 1~3)认为,比较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任何事物,通过比较,形态更具体,物质更鲜明,因而更便于人们去研究、去认识、去掌握。这是因为比较不仅可以提示事物的特殊本质,也可以借以认识诸种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英汉语比较研究主要是探讨英汉两种语言的同一性和异质性,后者往往是探讨的侧重点。与此不同,杨自俭(1997: 4)认为,对比语言学应该既研究两种语言的异,也研究两种语言的同,异和同应该是并重的,不应只偏向其中一个方面。与此类似,有学者指出,表面上发现的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有认知基础的语言的共同规律(沈家煊,1996: 13)。因此,我们认为,英汉辞格对比研究的侧重点有两个:一是发现英汉辞格的“同”与“异”,另一个是选取合适的理论视角(如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理论等)探究其共通的内部规律和机制。

其次,加强辞格对比的认知机制研究,注重认知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学科借鉴。

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涉及面广,包括语言内部的语音系统、词汇形态、句法结构等语言内部各要素,还包括语言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本

书主要探讨语义层面的辞格,这就不能不谈辞格的分类。在比较英汉修辞格时,李定坤按美学标准划分将汉英辞格分为联系美、变化美、均衡美、侧重美、声色美五大类;余立三和喻云根都打破了汉语对修辞格的传统归类,将要讨论的英汉修辞格大致分成三大类,即音韵修辞格、词义修辞格和句法修辞格。本书不刻意倾向于哪种分类方法,之所以将英汉辞格统一划分为语义辞格和非语义辞格两类并分在两本书进行研究,主要考虑对内在语用认知或认知心理机制的研究需相对集中,以便将来对“各种辞格内在机制有何相似性或统一规律”这一重要问题开展深入探究。本书所谓的“语义修辞格”与“非语义修辞格”相对,共涵盖 20 类辞格,书中均有详细阐述。

客观上,英汉语义修辞格对比研究呈现多层次立体交叉,运用起来特别复杂,虽然英汉修辞格之间存在着种种共性,但由于所有修辞格都依附在特定的语言材料之中,必然受其制约,英语和汉语分属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两者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同时,英汉语中各种修辞格的形成、运作和发展,又受制于各自的文化。因此,就概率而言,英汉语修辞格之间或基本对应或局部对应,程度上存在差异,通过对比研究找出其相通之处、差异之处乃至差异程度,既有利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又有利于利用汉语作为母语的优势促进英语修辞格的研究。

本书力图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前辈和时贤们的多种著述,广泛采集阅纳了优秀的期刊论文。一方面从定义、类型、语用功能、工作机制及翻译策略等理论角度就相关辞格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对比、论述;另一方面在传承经典与创新基础上精选了大量出自中外名篇名著的美文例句。其目的在于坚持学术研究的普及性与提高性兼具,不仅便于与学界专家开展学术性交流,还有利于英、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掌握英汉辞格理论的同时,吸收大量的、各异的、新鲜活泼的语言材料,在把握双语对比规律性的同时提高读者对英汉语的理解、表达和翻译能力。

陆俭明指出:“修辞研究比起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法研究来,应该说其难度要大得多”(2008: 33)。以本书作者的学养啃这样一块硬骨头,其中浅陋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界专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著者

2014 年 7 月

目 录

前言	vii
第一部分 宏观对比研究	1
第 1 章 英汉辞格概况	3
第 2 章 英汉语义辞格对比回顾	17
第二部分 微观对比研究	29
第 3 章 Allegory 与讽喻	31
第 4 章 Allusion 与典故	41
第 5 章 Analogy 与类比	66
第 6 章 Contrast 与对照	78
第 7 章 Epigram 与警策	96
第 8 章 Euphemism 与委婉	114
第 9 章 Hyperbole 与夸张	158
第 10 章 Irony 与反语	195
第 11 章 Metaphor 与隐喻	226
第 12 章 Metonymy、Synecdoche、Antonomasia 与借代	266
第 13 章 Oxymoron 与矛盾修饰法	298
第 14 章 Paradox 与反论(悖论;似非而是的隽语)	325
第 15 章 Parody 与仿拟	344
第 16 章 Personification 与拟人	385
第 17 章 Pun 与双关	415

第 18 章	Simile 与明喻	473
第 19 章	Synaesthesia 与通感	505
第 20 章	Transferred Epithet 与移就	540
第 21 章	Understatement 与低调陈述	579
第 22 章	Zeugma 与拈连	601
后记		633
参考文献		638
附录 1	国内语义辞格对比研究论文(1979~2013)	651
附录 2	国内英汉辞格对比(比较)著作	666

第一部分

宏观对比研究

第 1 章

英汉辞格概况

1. 英语辞格史脉络

英语修辞学起源于西方古典修辞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古代雄辩术,迄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在英语里,修辞学最初是“引进”学科,这种状态延续了上千年之久。直到 16 世纪以后,英国才开始有了威尔逊、坎贝尔等负有盛名的修辞学家。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方古典修辞学大师是亚里士多德,“今天所说的西方古典修辞学,其实是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以及西塞罗和昆提利安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挥”(胡曙中,1994: 4)。亚里士多德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是:修辞学是一门发现适用于任何主题的劝说方式的艺术(the faculty of observing in any given cas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胡曙中,1999: 461)。英语的修辞学(Rhetoric)就源于希腊文 *ῥητορικός* 与拉丁文 *rhētorica*,其本意就是“演讲的技巧”。这个本意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书主要的讨论范围。

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体系可以归纳如下:

在修辞演讲中,演讲人为了说服听众会采用非人工论证法和人工论证法(如图 1 所示)。非人工论证法是指那些现成的证明材料,如法律文书、合同、供词等,而人工论证法是指那些为能提高劝说效果所采用的手段,如逻辑、情感、人格等。在人工论辩中往往采用三段论的省略式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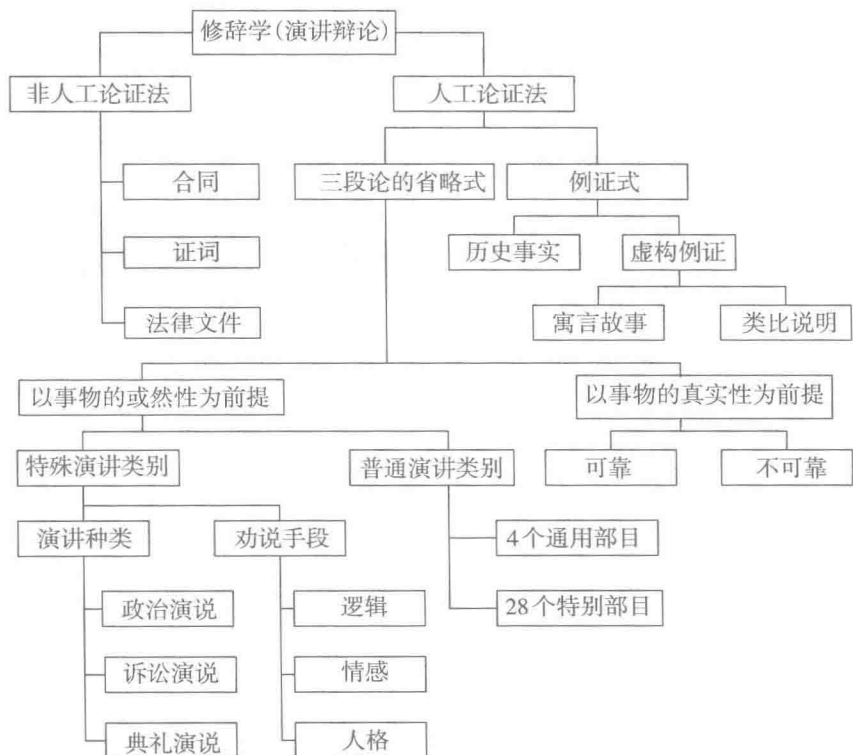


图1 西方古典修辞学体系

例证式的论辩模式。其中例证式又分为历史史实和虚构例证。前者指从过去历史中找出与现在情形相仿的实例,从而推出可能的结论进行论证;后者指通过寓言故事、类比说明等方式得出结论进行论证;而三段论的省略式分为以事物的或然性为前提和以事物的真实性为前提两类。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存在着“或然性”,以事物的或然性为前提的三段论的省略式在演讲论辩中更为实用。它主要分为两种——特殊演讲类别和普通演讲类别。特殊演讲类别包括演讲种类和劝说手段。普通演讲类别主要是演讲人将演讲内容归类分为四个通用部目(topoi)和28个特别部目。如果是以事物的真实性为前提的三段论,可分为可靠性和不可靠性。此类论证为逻辑意义上的三段论。

不难看出,图1系统地勾画出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的脉络,在构建了西方修辞学体系时,同时体现了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是继续研究和发展修辞学的宝贵财富。

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目标不外乎从大量的演讲词和话语中选择那些被认为具有劝说作用的成分并对这些成分进行分门别类地归纳(可视为辞格的源头之一),同时根据结构和目的对每一种类的成分进行分析并识别构成每一种类的方法。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西方古典修辞学家们探究语言使用的正误性原则,并不遗余力地对有效地使用语言的方法进行了分类。此外,它不仅对如何提出证据和论辩的方法进行说明,还为推理过程的各项原则作出规定。如上图所示,早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亚里士多德就把修辞学研究的问题归纳成一种理论,后来该理论又经过西赛罗和昆提利安进一步地发挥。可见,浩瀚的古典修辞学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几点,即修辞的话语种类和心理、听众分析法、演讲步骤等。

学界公认,古典修辞学的贡献之一在于将演讲过程划分为五个步骤:觅材取材、谋篇布局、文体风格、记忆、演讲技巧,这就是有名的“修辞五艺”。其中与衍生辞格密切相关的是觅材取材、文体风格^①和演讲技巧。其中,觅材取材是发现有效的或似乎有效的论辩,使一个人的演讲合理、合逻辑;文体风格是用恰当的语言匹配找到的材料;演讲技巧是用一种适合主题和文体的方式来控制嗓音和身体。其中,需要特别一说的是昆提利安^②把具体细节弄得一清二楚,尤其对文体风格作了全面论述。

在中世纪,由于专制主义的高压统治,共和制被废止,民众大会被解散,公民权利被剥夺,雄辩术很快失去了原先举足轻重、左右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沦为向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同时,由于活字印刷术和人们对于《圣经》的重视,修辞学实现了重要的转变,正式从口语修辞转到了书面修辞,逐渐成为一种规范与评价文学作品的工具,即中世纪大学课程的“三艺”(语法、逻辑、修辞)之一,在人文教育中享有很高的地

① 文体风格研究体现为一批冗长文章和教材的修辞学传统,提出了很多概念来识别各种修辞格或“修辞比喻”。这些辞格有一些是形式的,如头韵,还有一些辞格涉及句法,如连接词的省略。不过,许多的修辞比喻则是词汇现象和语义现象,如委婉语(Geeraerts, 2013: 12)。

② 在他的《雄辩术原理》一书中,昆提利安对隐喻、转喻、提喻等辞格均有阐述。此外,他还阐述了几点与辞格相关的观点。其中第一,各种对辞格划分的看法并不一致;第二,昆提利安与传统修辞主流的关注不同,他专门讨论文学作品和演说中的日常辞格(Geeraerts, 2013: 13-14)。

位。文艺复兴使古希腊、罗马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古典修辞学也重新得到认识与研究。

但不可否认,“随着民主制度的衰亡,公共演讲,尤其是公开的议政演讲和法律演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宣德演讲逐渐成为修辞教育的核心。这导致了修辞学逐渐脱离具体的内容,转而关注风格的锤炼和辞藻的修饰。换言之,文体风格逐渐取代了人文传统。相比较后者,文体风格传统重表达,轻思想,重审美,轻社会功能,着眼于文体风格”(顾曰国,1990: 15)。

也就是说,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古典修辞学由注重“论辩”和“说服”转向对“语言风格”的关注。当然,不同学者在研究古典修辞学时有不同出发点和侧重点,但总体上体现两种倾向^③:一种是以研究辞格为主,有人称之为辞格修辞学(Tropological Rhetoric),这与我们汉语修辞学比较类似;另一种是以说服、论辩为主的说理修辞学(Persuasive Rhetoric)。具体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遵循了上述的分流,后者被称为传统派,而前者被称为文体风格派。这一派首先将修辞五艺中的前两艺剔除出了修辞学研究范围,继而在后三艺中以文体风格为研究重点,最终将文体风格的研究又压缩为修辞格的研究,也可以称为修辞格派(丛莱庭,2007: 41~44)。不难看出,这一方面促成了修辞格研究的繁荣兴旺,另一方面也埋下了19世纪下半叶修辞学走向没落的种子^④(顾曰国,1990: 15)。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为信念、语言和行动确定了一种理论的关系。伊索克拉底、西塞罗和昆提利安都适应了这种理论并把它付诸实践。从昆提利安时代开始,修辞学史上就出现了范畴的缩小、功能的划分、理论和实践之间不断出现戏剧性的分隔。修辞学范围缩小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Peter Ramus把觅材、取材和构思布局划归逻辑学,这样修辞学的研究内容只剩下了文体风格。直到新修辞学时代的哲学家们开始重新

③ 米丽阿蒙·约瑟夫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家分为三大派。

④ 这种没落表现为文体风格逐渐走向了极端的形式主义,修辞学研究蜕变为费尽心机寻找新的修辞格和对已发现修辞格进行越来越细的分类(16世纪的George Puttenham区分了107种修辞格,Miriam Joseph考察了200多种,参考蓝纯,2010: 59,另外参考肖耘,1987: 94)。人们在这个时期对修辞学完全失去了兴趣。而进入20世纪,在欧洲,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形成了stylistics独霸一方的局面,而在美国人文主义抬头,占据了修辞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把语言的重要性认为是创造意义的活动时,修辞学才有机会恢复了一些失去的地位,才有机会为教育和普遍行为提供信息。国内外的很多学者认为现代修辞学的特点是理解、共享和双向交际,尽管他们已认识到在修辞学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了脱钩和在修辞学学科中出现了严重分歧的情况^⑤。

因此,蓝纯在总结西方修辞学史之后将英语修辞学即“rhetoric”界定为“the art of effectively using language in speech or writing, including the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 and the cultivation of different styles, so as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others.”就凸显了三点:(1)书面语或口语;(2)文体和修辞格;(3)劝服为目的等。

英语修辞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距今不过五百年的历史。确切地讲,直到1524年,世界上才有了第一本用英语撰写的修辞学著作,即英国人考克斯(Leonard Cox)的著作《修辞艺术》。而修辞学在美国的历史更短,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美国的修辞学研究历史不长,但其学科地位独特。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的英语修辞学家沿袭前人,发展了修辞学理论。尽管作为一门学科,英语修辞学一直经受着正反两方面的考验,褒贬不一。可是20世纪的交际需要促使人们不得不诉诸修辞学,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无论口语修辞还是书面修辞,都不得不重新采用亚里士多德等前人奠定的传统修辞学,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将其加工提炼并赋予时代气息和崭新视角。

本来,修辞学这门学科理论性很强,但发展到19世纪中叶已成为一门实践性学科。近几十年来,英语修辞学又兴盛起来,其原因众多。首先,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首创了演讲系(Speech Department)。同时,莫蒂默·艾德勒(Mortimer Adler)独创性地把修辞学运用于作品阅读。为此他专门撰写了《怎样进行阅读》(How to Read a Book)一文,阐明分析作品的准则和技巧。他的创新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开拓了修辞学发展的新领域,使修辞学从原来的综合学科发展为分析学科——它既可用来指导我们写作和讲演,提高我们的表达能力和语

⑤ 在当时,这些脱离社会现实、毫无实用价值、繁杂琐碎的做法激起一些人的不满,遭到了嘲弄与反对。如理查德·马凯昂在《中世纪的修辞学》一文中指出:“确实,不管用一门学科的哪一方面(语言风格或文学价值或话语效果)来衡量这一时期修辞学的成就,修辞学在中世纪都可以说毫无历史可言”。

言效果,也可用来帮助我们阅读作品,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技巧,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艺理论出现新批判主义(New Criticism)这一新的流派,加之20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学、语义学和其他人文科学都有了新的发展,而这一切都促使修辞学家把修辞学与语言心理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一门重要的跨学科理论,被称为“新修辞学(new rhetoric)”。再次,语言学研究的新成就也促进了“新修辞学”的形成。其中,福勒(Roger Fowler)和利奇(Geoffrey Leech)等对文体学的研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转换生成语法的研究,特别是斯金纳(Francis Skinner)对语言心理学的研究,都对“新修辞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电子媒介的广泛运用,不仅扩大了语言使用的范围,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交流思想的形式,从而迫使修辞学家去探索新的修辞学理论或视角。现在,修辞学既应用于口语和写作,应用于语言和文学,也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甚至有研究者将游行、集会等政治活动,音乐、电影等文化活动也放在修辞学中进行研究,并将其命名为非言语修辞学(non-verbal rhetoric)。总之,这个时期的美国修辞学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使用范围越来越宽广,由于当今社会各领域均依赖于修辞学,使其不断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可见,进入18世纪之后,英语修辞学(英美国家为代表)已经将心理和社会作为修辞实践和理论的着眼点,那么辞格已不再是修辞学关注的重点,虽然这一点在不同的国家程度不同^⑥。

当前,我国的英语修辞研究主要在下述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继续对传统修辞学和现代修辞学派进行研究,继承和发扬英语修辞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吸收现代修辞学的新观念、新思路和新方法,改进和提高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二是把英语修辞同汉语修辞加以对比研究,既推动中外文

⑥ 如果说古典修辞学理论的特点是“以语法为重点”,18世纪修辞学的特点是“以心理为重点”,那么现代美国新修辞学的特点是以“社会或社会学为重点”。美国新修辞学虽然体系复杂、学派众多,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修辞学是一种理解和改善人际关系的工具。古代修辞学家对一种“事业”的实质或主题的各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18世纪修辞学家们强调信息与大脑之关系,而美国新修辞学家们的兴趣在于作为信息传递中一种传统手段的语言。当然,除了这一点,他们还认识到虽然语言是人类交际时的主要工具,但是其他的符号体系虽然有时未被发送者或接受者所认识,也承载着影响思想或行为的重要信息。